

Discussing
World

纵议天下

经济讲演录  张曙光 / 主编

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

天则十年丛书 盛洪主编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Discussing
World

纵议天下

经济讲演录 张曙光 / 主编

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

天则十年丛书 盛洪主编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纵议天下:经济讲演录/张曙光主编. —郑州:郑州大学出版社,2004. 1

(天则十年丛书·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/盛洪)

ISBN 7-81048-801-5

I. 纵… II. 张… III. 经济学-演讲-文集
IV. F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2738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

开本:635 mm×960 mm

印张:25.375

字数:341 千字

版次: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)

发行部电话:0371-6966070

1/16

印次: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1048-801-5/F·24 定价:31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前言

我们呈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,汇集了百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在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上所做的学术报告和讲演。

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,是一家非政府、非盈利的公众机构和民间研究组织。天则所成立不久,就创办了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,每两个星期定期举办一次学术讨论,到2002年底,已经举行了231期。本丛书中收入的论文,就是从这231期中精选出来的。

创办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的初衷,是要为学界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,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,使大家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,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,进而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,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,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。经过近十年的实践,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原来的设想,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。

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的运作方式是:每次邀请一位主讲人,就

某一问题报告自己近期研究的成果和心得,时间约一小时左右;同时请两位同行评议人,对主讲人的报告进行评论,时间半小时左右;然后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提问和讨论。如果言犹未尽,正式会议结束以后,还可以留下来继续交谈和切磋。现在,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,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一是论坛的开放性。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论坛,这集中反映在论坛参加者的来源上。我们每次主动邀请的人只有三四位专家,其中,主讲人来源分为三类:一部分是我们邀请的,一部分是别人推荐的,一部分是毛遂自荐,自己报名要求的。只要提供的报告达到一定水平,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,都可成为论坛的主讲人。因此,主讲人中既有著名的专家学者,也有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人物”;经常出现“小人物”主讲,“大人物”评议的情况。出席论坛的其他人完全是自主选择 and 自由参与。我们提前一周将论坛的主题和主讲人的信息在天则网上发布,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前来参加,没有任何身份和资格的限制。因而参加的人既有专家学者,也有大学生和研究生;既有政府官员,也有企业界的人士;既有国外学者,也有驻华使馆的官员;既有一些常客,也有很多新面孔;人数一般保持在四五十人左右,少则二三十人,多则六七十人。开放性既是论坛学术定位的要求,也使主办者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,是论坛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二是论题的广泛性。在 230 余次论坛中,论题以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为主,约占 2/3 左右,同时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,包括法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史学、哲学和科学学等;时间和空间范围虽以近现代和国内问题为主,但上溯至远古,下追之未来,近及周边国家和地区,远涉欧美和世界各地;既有非常抽象的理论问题,如汪丁丁的“有限理性和脑神经元的可预期行为”,陈平的“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、多样性和复杂性——新古典均衡理论的危机和复杂系统科学的展望”,张岩的“华夏文明的肇始历程”,赵南元的“认知科学和广义进化论”等,也有重大的现实问题,包括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,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问题、俄罗斯危机和科索沃战争问题、南沙群岛和西藏问题等。而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,诸如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、财政金融结构和资本市场发展、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,三农问题、粮食问题和城市化的问题等,几乎

都做过讨论,有的甚至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多次。因此,从一定意义上讲,双周学术论坛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近十年我们走过的道路,也反映了我们的生存环境。

三是良好的学术氛围。在“双周学术论坛”上,演讲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出现,不代表任何组织和机构发言,因而,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,主办者不设置任何禁区和限制,不管其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如何,只要言而有据,言之成理,都可以在论坛上发表演讲。参与者也可以自由提问和发表评论,可以赞同,也可以批评,可以提供补充,也可以展开辩论,只要不是人身攻击,不是冷嘲热讽,什么话都可以讲。因而,论坛的气氛既轻松、自由、愉快,又紧张、活泼、热烈。有时,意见针锋相对,各不相让,论辩得非常激烈;有时,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,相互补充,各得其妙;有时,不同学科的人参与讨论,相互启发,相互学习,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。因此,凡经常参加论坛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:这里是一块可以自由思想的净土。

目前,全国各地举办的论坛多种多样,五花八门,不可胜数,但真正能够坚持做下去的不多,有影响的更少。不要说举办频率较高的论坛,就是一年一次或者几次的定期和不定期论坛,也往往是雷声大、雨点小,虎头蛇尾。其原因在于,预期太高,目标过多,没有自己的特色。一些论坛以盈利为目标,开始时大张旗鼓,搞得轰轰烈烈,一旦无利可图,自然偃旗息鼓,关门大吉;一些论坛追求社会宣传和社会轰动效应,专门邀请名人、大官和各种媒体记者,在大宾馆大饭店举办,以上报纸上电视、进行炒作见长,而论坛讨论内容则在其次,长此以往,也难坚持;一些研究机构组织的论坛,也因无明确目标,随着人事的变迁,也忽冷忽热,有时过分密集,有时又长期停开。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既不以盈利为目标,也不追求社会轰动效应,而是老老实实地进行学术交流。不论是名人,还是官员,到了这里都是平等的一员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论坛基本上都在天则所简陋的会议室中进行,似乎离开了天则所(中间有几次曾在所外举行)就没有了那种气氛。但我们对讲演的内容却有严格的要求,有人多次要求来做讲演,都没有安排,就是为了保证论坛的质量。正因为如此,论坛在平平淡淡中一直坚持了下来,有了两百多次的积累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

在 230 余次论坛中,不能说每次都很精彩,但精彩的报告确实不少,而且绝大多数

报告的内容都是比较充实的,所以才能一直坚持下来。有个别主讲人的报告不够充实,但讨论却非常热烈,也相当深入,弥补了报告的不足。为了使读者能够分享,我们编辑出版这个集子。从 231 次论坛中选出 76 次,汇编成四集:经济学和经济问题两集,其他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一集,读书会和书评一集。丛书按论坛次序编排。

本丛书的编辑出版,既要感谢各位主讲人和参与者的积极参与,也要感谢天则所有关职工提供的支持和服务,还要感谢郑州大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,同时要感谢为论坛提供赞助的美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(CIPE)。

张曙光

目录

黄有光

从偏好到快乐—— 1

肖耿

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—— 23

樊纲

经济转轨中非国有经济成长的理论分析—— 61

刘小玄

产权、市场和效率—— 85

张维迎

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—— 97

周其仁

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—— 113

目 录

• 1 •

胡景北

中国经济发展机制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思路——129

钱颖一

第三种视角看“转轨”——161

平新乔

银行微观经济理论——179

王志乐

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对中国企业的影响——201

李绍荣

交换经济的市场过程——227

陈平

弗里希幻想，卢卡斯谬见，弗里德曼“妖精”——253

陈惠雄

人本经济学与快乐——277

徐滇庆 耿健

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输入——307

张欣

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最佳通胀率——329

薛澜

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：中国的案例—— 353

姚洋

对婚外恋的经济学分析—— 375



黄有光演讲场所外景

黄有光

澳大利亚籍华人经济学家,莫纳什大学教授



黄有光

从偏好到快乐

讲 演

我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开始,就是搞福利经济学的,但是我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全的,因为它只探讨关于人们偏好或者效用的问题,而没有真正探讨福利或快乐的问题。偏好和福利是有差异的,我们待会儿会谈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福利,就会和只探讨偏好得出不同的结论。

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发展到现在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进程,就是开始经济学只探讨生产、消费、分配等比较客观的东西,然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偏好和人们的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,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的,因为偏好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,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一样。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用,但效用我认为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,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福利,或者福祉。那么福利是什么?我认为福利就是快乐,如果不考虑时间长短可能造成的微小差异的话,幸福和快乐是一样的。而快乐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你工作可能是为了赚钱,也可能

从偏好到快乐

是为了给社会做出贡献,但为社会做贡献最终也是为了他人的快乐。所以我认为快乐就是终极的目的,要问快乐本身是为了什么的话,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,快乐就是为了快乐,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。那对自己来讲快乐是个什么东西?我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,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。但不是所有的感受都和快乐有关。我可以感到这个东西是青色的,但青色既没有让我高兴也没有让我痛苦,那么这就不属于心理学上叫做“affective”的东西,但快乐和痛苦就属于“affective”的,它会影响你,使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对任何词下完全的定义都是不可能的,所以讲到这里我想,每个人都知道有快乐有痛苦,享受不管是物质上的吃喝玩乐,还是精神上的,例如你的孩子成绩考得很好让你很高兴,都是快乐的;痛苦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。实际上痛苦和快乐都是精神上的,只是说造成痛苦和快乐的原因分为物质和精神的。所以,快乐的时候就是正的,痛苦的时候就是负的,因此在快乐和痛苦中间有个零点,上面的面积减去下面的面积就是一个人的净快乐。

但是有人说,我们经济学不是研究快乐的,这属于心理学、社会学研究的范围。对此我想,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,同样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效用、偏好不是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,而是属于心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。这种自己给自己加上的限制,我认为是影响经济学分析的发展的。我这个观点同样也是个人的观点,不过我认为,从我个人的观察和跟朋友的交谈,以及包括我本人和其他人所做的一些研究,通过生物学的道理,都可以说明我这个观点不是特殊的,而是一般的、大家都持有的观点。我甚至认为,最终而言,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以快乐来衡量的。不过从这篇文章来说,你不需要同意我的这个哲学家会认为是极端的观点,只要同意我所说的快乐或福利、福祉是重要的就行了。

我们先谈偏好或效用与福利或快乐的不同。现代经济学是把效用代表偏好,而我用福利来代表快乐。所以有时我讲偏好和福利的不同,有时我讲效用和福利的不同,有时我讲偏好和快乐的不同,都是一样的。比较古老的经济

有时把快乐跟效用等同,但我现在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用法,把偏好和效用等同。而把偏好或效用同福利对立时,这二者主要有三点区别:

第一,当一个人“无知”,或者说信息不足的时候它们的不同。例如我以前有幸去樊纲家里吃饭,吃完饭后他驾车送我回家。我说现在坐出租车也很方便,他说的确如此,但当时他买这辆车时不知道现在会有这么多出租车,否则就不买了。那时他以为买了车以后会给他带来快乐,因为更方便了,所以当时他的偏好是买那辆车;但事后却没有增加他的快乐,事实上他的快乐反而因为买车而减少了。这就是因为无知(众笑)。所以樊纲这种偏好跟他的福利是不一致的。由于无知或信息的不足造成对将来的事件不能完全预测、从而偏好和福利不一致的情形,是大家所公认的。

第二个使偏好和福利不同的是,偏好虽然可能大体上照顾自己的快乐,但在某些程度上他也可能会照顾其他人的福利。这就会造成不同。当然,如果你做一些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其他人有利的事,也可能会感到快乐,所以纵使是利他的情形,也不一定会带来偏好和快乐的问题。但是,当你捐一万块钱给慈善事业时,你自己的消费由于这一万块钱的损失所减少的快乐,如果大于你捐这些钱所带来的满足如社会地位的提搞、别人认为你是个好人等时,才是对你快乐真正的减少。如果你认为虽然我的快乐减少了,但其他人的快乐增加了,这就会有差异。我在1999年一篇文章里曾经举例证明了这个差异确实存在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
第三,在无理性的情形下,偏好和福利是不同的。如果你偏好某样会减少你的福利的事情,但这种偏好不是由于樊纲这样的“无知”(众笑),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福利,那么我就把它叫做无理性的。加上按此定义的非理性,就概括了所有的偏好和福利的差异。你可能认为这样定义非理性是可以争议的,但若是你接受了这个定义,那么这三个方面就概括了所有的差异。

有的经济学家谈及或接近过这个问题。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海萨尼,1997年就强调我们不应只看重偏好,还要避免无知的影响。还有的经济学家讲到,

即使经济增长很高,快乐也不见得高,应看到社会发展的社会成本。而对于会计的国民所得是不够的,必须考虑空气污染、环境等,有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到这方面问题。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考虑无知的情形,也假定人们是有理性的,这种简单的假定在许多情形下是必要的,而且使我们的经济分析能够得出比较明显的结论。但如果在一些无知、无理性比较重要的情况下,这些假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,因而就必须进行修正。

这篇文章所主要强调的是,在现代的物质主义社会里,就有一些天生的原因或后天影响——如广告、电视等,使人们倾向于过分追求物质、金钱上的东西,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对于快乐更重要的东西。即使不是生物学家,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,像蚂蚁、老鼠、松鼠这些动物,都是由本能来储藏食物的,这种本能使它们更加容易生存,在冬天或食物缺乏时可以用这些储藏来维持生命。同样的,我们人类也有这种累积物质的本能,而这种本能大体上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,就是说,我们物质越多,在困难的时候就更容易生存下去。但是,当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,我们所累积、储蓄的物质已经相当高了,这时候如果还继续累积物质的话,就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。虽然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,例如西北乡下有些地区连温饱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,强调这一点有点超前,但我认为与其亡羊补牢、事后补救,不如未雨绸缪、事先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还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全世界而言的,不只是针对中国的。另外,现在到处都有的广告,从电视到报纸、杂志,都鼓励人们拼命消费、买东西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,就会使人们过分强调金钱,而忽视了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,使得人们对于更高的所得有不可满足的需求。例如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,问的问题是“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”,答案是,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。所以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,人们永远不能得到满足。

那么我们不得不问,所得很高是否会使人们感到快乐?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所得和快乐的正相关是很低的。例如新加坡的人均

▲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,而不是因果关系。可能的一个解释是,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,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。

所得是印度的 80 多倍,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 16 倍,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,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。还有其他一些指标。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可能是,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等。例如为什么在日本和法国的情形下快乐水平降低了?法国是因为戴高乐讲过一句话:“只有傻瓜才是快乐的。”所以人们在问及快不快乐(是根据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设计的一些指标,如问你是非常快乐、快乐、不快乐还是很快乐,或者用 0~4 的数据来表示等)时,不敢回答自己是快乐的(众笑)。日本人可能是因为跟华人有些类似,不愿夸大自己真实的快乐,所以往往只回答“还可以”。

下面我们再用同一个文化、同一个国家来比较。这一比较也说明了快乐和所得之间有一点正相关,但相关度很低。调查资料显示,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 2% 左右。而把所有的客观因素,包括人口学因素、所得、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教育水平、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,也只能解释快乐的 20% 左右。若从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话,相关性就更低了,因为婚姻对快乐是有很大大关系的。根据美国 1972~1989 年的调查资料,可以看出,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 40% 左右,没结婚的只有 23% 左右,两条线相差很大。也就是说,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。〔盛洪:没结婚这条线好像是往上走的(众笑)。〕只有一点。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,而不是因果关系。可能的一个解释是,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,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。所以结婚对快乐是重要的,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点(众笑)。研究婚姻对快乐的重要性,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,即二者正相关。

另外,在所得很低时,提高所得得到的快乐较多;当所得达到一定点时,所增加的快乐就会减少。如果考虑到这种边际快乐随所得上升而下降的话,那么开始的消费水平不应太高,要逐渐改善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。不过,如果一开始所得过低,也会影响快乐。比如会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影响他的健康,从而影响以后长时期的快乐。从这一点来看,有钱人的孩子与其说有“advan-